

# The Ancient “Inner Saint and Outer King” and Today’s “Cultivation of Official Virtue”

Xueying Lil<sup>1</sup> Yuchi Liu<sup>2</sup>

1. Graduate School of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2.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Municipal Party School, Yueyang, Hunan, 414000, China

## Abstract

Confucius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taking morality for government”, unified political ide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constructed the initial ecological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and moral culture. The thought of “inner saint and outer king” originated from the thought of “respect for virtue” in the Xia and Shang dynasties, and was further developed in the process of contention between the scholar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Taoist Zhuangzi first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inner saint and outer king” clearly, and Confucius’ thought of “benevolence” and “taking virtue government” regarded “inner saint” as the basis of “outer king”. Since then, the thought of “inner saint and outer king” has evolv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The main features of “inner saint and outer king” are mainly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entleman’s charact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taking the world as his own responsibility and the value understanding of worrying about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Among them, the excellent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shows the modern value suitable for the new era, and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moral shaping of Chinese officials and cadres at all levels.

## Keywords

inner saint and outer king; cultivation of official virtue; historical process; main characteristics; modern value

## 古之“内圣外王”与今之“官德修养”

李雪莹<sup>1</sup> 刘宇赤<sup>2</sup>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中国·北京 102488

2. 市委党校行政学院, 中国·湖南 岳阳 414000

## 摘要

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思想, 将政治理想和道德修养统一起来, 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道德文化的发展构筑了最初的生态框架。“内圣外王”思想发源于夏商时代的“敬德”思想, 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争鸣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道家庄子首先明确提出了“内圣外王”的概念, 孔子的“仁”和“为政以德”的思想则将“内圣”视为“外王”的基础。此后, “内圣外王”思想随着儒学的发展不断地演进。“内圣外王”的主体特征主要表现为君子品行的人格特征, 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和忧国忧民的价值认识。其中, 优秀的思想文化内涵显示出与新时代相适应的现代价值, 对当今中国官员及各级干部的道德塑造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关键词

内圣外王; 官德修养; 历史进程; 主体特征; 现代价值

## 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用权讲官德, 交往有原则》一文中谈到: 德, 不仅是“立身”之本, 而且是“立国”之基。中国历代思想家既重视以德修身, 也重视从政以德。“为政以

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德不称位, 能不称官, 赏不当功, 罚不当罪, 不祥莫大焉。”(《荀子》)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也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我们党善于继承人类一切优秀历史文化遗产, 并立足现实, 着眼于古代德治思想的当代阐释, 以此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内圣外王”是中国最传统道德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典型思想, “内圣外王”之道, 最初发轫于道家庄子, 却被儒家发扬光大。在儒学的进化过程中, “内圣外王”思想也随之丰富发展。从先秦时期儒家的“修身”之术渐至两宋变成理

【基金项目】本课题系湖南省委党校系统课题《中国传统文化与官德修养研究》(项目编号: 2018DX08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雪莹, 女,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博士生。刘宇赤, 男, 中共岳阳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副校长, 研究员。

学家的“性理”之学，完成了从理性思辨到实践哲学的转变。明清以降，“内圣外王”思潮有波澜，但是始终都在引导士大夫们加强道德修养，实现事业建树。

## 2 “内圣外王”的思想渊源和历史进程

“内圣外王”的概念最早由庄子在《天下篇》中提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源于一（道）”，“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闾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个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孟子指出了“圣人”和“君子”的标准：“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清人郭庆藩在注解中说道这四端是贤人君子所应服膺。所谓“内圣外王”，就是内修圣人之德，完善个人人格；外施王政，实现自我价值。“内圣外王”的思想被道家庄子正式提出，但是其中所含的道德意识却在夏商周时代就有痕迹。

“内圣”发源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西周礼乐文化孕育了中国最早的人文主义，而礼乐文化自身又包含着理性和德性双重因素。人文思潮在宗教性的演进和人文性的积累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德性精神。与西方文化认为道德起源于狩猎社会中个体的合作意识、并最终形成一种“防御机制”不同，中国文化中的“道德”，是在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当中形成的一种道德思考。“道德”感的诞生，就意味着人的行为必须受到理性意识的约束。“德治”最早体现在尧、舜等上古时代的贤明君主身上。尧帝自身“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尚书·尧典》）。而舜帝则授大禹以“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法，告诫其言行不偏不倚，符合中正之道。周公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也是为了让统治者做到“以德配天”。周代“崇德尊民”的政治文化思想奠定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在“伦理本位的社会”中，礼乐文化向着宇宙、道德、政治的精神世界发展。

春秋中后期，内乱并生，宗法解体。前诸子时代的智者开始考虑社会秩序的协调和个人德性的积累。郑子产最早提出“以德治国”的概念雏形：“德，国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在礼乐文明的基调之下，郑子产将“德”视为实现“乐”的前提。“乐”本身，是为了唤起人们内心的秩序，而“礼”则是从外部进一步规范人的行为道德，最终构建起一个和谐而有序的社会政治文化秩序。《尚书》中也明确提出“德”与“否”

两种德行的极端对于国家治理产生完全相反的影响：“德惟治，否德乱”（《太甲》）。可见，“为政以德”在孔子以前就已经是清明政治的重要标准了。理性的思考和道德的实践，在春秋时代迎来了诸子百家的“人本性”的全面跃动。

孔子是“内圣外王”之道的创立者。他将“仁”作为最高的道德规范，让中国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确立了“德”的依据和主张。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试图以西周的礼乐文明为母体，通过“礼文化”来重新建立理想的社会伦理规范。“礼文化在形式上乐、义、仪、俗、制、教六种正义，而礼的精神是倡导道德与文明”。“礼”的秩序性和道德性使其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孔子将“仁”和“礼”建立起一种联系：“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孔子释“礼”归“仁”，将社会秩序和人伦关系彼此相连，“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外在社会伦常秩序反过来必须依赖于兄弟朋友内在的‘知、仁、勇’的主观修养才能建立和存在”。构筑在道德精神之上的人伦关系具体到个人修养上，就是“君子”人格。孔子确立了君子人格的几条标准：“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除了这些，孔子直接将“内圣”的道德要求与“外王”的王道政治统一起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他不仅普遍倡导“谦谦君子之风”，以此来进一步完善道德规范，对于为政者，则提出“正身”要求：“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也就是说，如果道德品行良好，那么从政就没有什么困难。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道之以德”，将道德作为指导，将道德落实到实践中，这样才能避免霸道和暴政的出现。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内圣外王”的字眼，但是他通过道德和政治统一的思想，将“内圣”看作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础，这是“内圣外王”思想在儒家中的初步发端。

孟子对于“内圣外王”之道的阐发具体表现为“仁政”与“性善论”，对于“人性”的讨论也奠定了心性学的基础。他继承孔子的仁学主张，输入新的内容，主张实行“仁政”。孟子提出“性善论”，认为“仁心”是人之天性：“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告子上》）。“仁”和“义”都是人本身自有的，所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等道德感皆是人之本能，而这四种心理则是仁、义、礼、智的萌芽。孟子将尽心养性（内圣）看作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存其心，养其性……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章句上》）他将当时流行于思想领域的“气”的概念和“性善”结合起来，认为如果人们尽力在内心扩大和培养仁、义等善性，那么就能隔绝外界的诱惑，就能“不动心”，如此，人的内心会产生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是孟子的“内圣”之法。孟子所谓的“大丈夫”，也是“内圣”与“外王”的辩证实践。“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得志”与“不得志”是大丈夫面临或所处的两种对立的环境。而“内圣”与“外王”的转换，也是根据所处的环境来适时地调整，“穷（处）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善）天下”（《尽心章句上》）。“穷”和“达”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毕生面临的两种生命价值状态。孟子提出通达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保持忧患，“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不仅如此，他还从自己的“民本思想”出发，明确指出为政者实现内圣到外王的转变途径就是与民同忧乐，即“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章句下》）。

荀子的“内圣”与“外王”又不同于孔孟，“化性其伪”和“隆重礼法”的理论让内圣之学和外王之道结合起来，构成了相对完备的学说体系。荀子运用儒家的“礼义”，吸收法家思想，扩充了“德治”的外延。与孟子相反，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人的本性是恶的，所以需要后天的学习和作为来达到“善”。他还列举了舜、禹、桀、跖等例子，说他们都是“执注错习俗之所积耳”《荣辱篇》。荀子主张化“性”起“伪”，后天不断学习，以此修习成为道德高尚的人。而这种“见善自存，见不善自省”的修身之术便是“内圣”。《修身篇》中提出了具体的修养之道。先是区分“善”与“不善”，而这种辩善能力就是荀子所谓的礼。人的血气、意志、知虑，饮食、衣服、居处、动静、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等皆属“治心养性”之列。对于“外王”，荀子也提出了不同身份的人相应地“外王”之法。“隆礼至法”“尚贤使能”“篡论公察”“赏克罚偷，兼听齐明”（《君道篇》）是为君之道，“尊君”“爱民”“恭敬而逊”“听从而敏”“敬人”（《臣道篇》）是为臣之道，“衡听”“显幽”“重明”“退奸”“进良”（《致士篇》）是为士之道。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从“仁”到“仁政”再到“仁义”，“仁”

的内涵不断扩展，孔子注重个人修养，孟子扩展到政治治理，荀子则扩充为社会道德。

汉初，在政治思想领域，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学正式成为社会的主流正统思想。董仲舒将先秦儒家的五种道德价值观“仁、义、礼、智、信”并为“五常”，要求王者实行仁政，以此稳固统治秩序。陆贾《新语》遵循“行仁义，法先圣”的儒家主张，贾谊从“民本”的角度阐释了“仁义”的重要性。东汉后期，谶纬之学兴起，魏晋南北朝时，玄言清淡盛行，儒学渐衰，内圣外王之说也便沉寂。

隋唐时期，开创科举，《五经正义》的编撰和反神学思潮的涌起，让儒学重放光芒。韩愈提出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儒学“道统”传承谱系。一些杰出的诗人大多受到儒学的影响，都亲身实践着“内圣”与“外王”。如白居易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与元九书》）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杜甫则用现实主义“史诗”创作寄托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社会理想。

两宋以降，宋儒的“内圣外王”显得比任何时期都外放。“重文抑武”政策和经筵讲学等让儒家文化再次兴盛。与此同时，理学思潮涌起，理学家们通过注解经书，让经学和理学互为表里。王安石“荆公新学”，重新辩解人性，认为性没有善恶之分，上智和下愚可以根据后天的修炼而达到不同的后果。周敦颐创立“理”的范畴说，提出“主静”的道德修养方法：“圣人中正仁义，动静周流，而其动也必主乎静”（《太极图说》）。张载关学提出“穷神知化”和“穷理尽性”思想，阐释了很多理学关于道德修养的理论。程颐、程颢则在“气质之性”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至善”与“性恶”的问题，“善”就是“天理”的本质特征，而恶则是不合节度的“人欲”。理学的认识论和道德修养紧密相关，二程“格物致知”和“克己复礼”的命题成为理学明确而有系统的道德修养论。南宋时，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引用张载“理一分殊”说，引出其道德起源论。陆九渊的“心本论”和简易功夫则减少了许多修养程序，让道德修养论变得更加简易。正是因理学对于修养功夫的注重，所以使一些学者认为“宋明儒者的成就和贡献，毕竟偏重于内圣一面，外王事功方面，则缺少积极的讲论和贡献”。但实际上，北宋中后期，可以说是“内圣外王”的极盛时期。在“君子政治”的社会架构下，

“内圣”和“外王”通过心性修养和政治才能，最终统一于“修齐治平”的宏大理想中。如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等人，他们虽然不像理学家那样有诸多的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论，但都在用儒学的思想指导着自己的行为。范仲淹“进则先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谢转礼部侍郎表》）的人生观打通了内圣到外王的践履之道。王安石通过修经，把“经典”引向“经世”的意图，扩大了“外王”的边界。而且从政治地位上而言，他们官至参政知事（副宰相），都达到了文人政治的相对高度，即在一定程度上都实现了“外王”。因此，“内圣外王”思想在北宋一朝达到了历史进程中的闪耀期。

这种情况能在宋代士大夫身上出现，不外乎三种原因：就身份而言，他们大多集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多种身份于一身。就地位而言，“右文”政策使文人有更多机会进入皇权周围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就思想而言，宋儒视道统高于一切，行为论事也趋向“君子”。王禹偁曾言：“士君子者，道也；行道者，位也。道与位并，则敷而为业”（《东观集序》）。欧阳修则曰“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与张秀才第二书》）。司马光则言：“君子修身治心，则与人共其道”（《越州张推官字序》）。宋儒们强调个体“君子”人格的培养，“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答李诩第二书》），还重视实现宏大的社会价值，将视线放眼到更高的家国层面。

“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体性人格理想和历史使命感与朝廷安邦定国的价值诉求相契合”，他们“修己”以“安百姓”，形成宏大的“天下观”。

元朝，孔子的美誉达到很高的程度，但是，“九儒十丐”的说法也证明了当时儒生地位之低。因此，这个时期，算是“内圣外王”的暗淡期。明初，朱元璋、刘基等确立朱学的统治地位，教育领域以“四书”“五经”作为主要依据，三部《大全》的编撰，更是奠定了朱学与八股科举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宋濂等人对心性做了繁琐的论述，但总体上注重道德的实践与修养，陈献章的心学则以“自然为宗”为修养目标，提出“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显露”（《复赵提学》）的修养方法。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心即理”的学说，进一步指出了“理”就是“天理”，突出了其道德性质。“致良知”则注重人在修养功夫中的参与，最后“知行合一”，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性。黄宗羲、顾炎武、

王夫之等人或对理学进行批判，或进行修正，奠定了启蒙思想的萌芽。

如果将明清之际理学家的修养功夫看作“内圣”，那这时“外王”的身影在历史的长河中显得非常单薄。“内圣”者无法“外王”，“外王”者可能并不“内圣”。因此，极少出现能让学者翕然宗之的引导者，即便像李东阳这样职官至于内阁首辅，文能引领七子风尚，但是，在“内圣”上鲜见评语。

清代在文化政策上软硬兼施。高压政策下，汉族知识分子人人头上悬着“达摩克利斯剑”，学者埋首古经。怀柔政策下，提倡理学，“博学宏词科”招揽大量人才。清代学者因循汉儒之迹，从经学中找到治世之方，形成“专门汉学”。晚清时期，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说道“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此时的“内圣外王”已经变为事功之业。对于集“道”“学”“政”于一身的曾国藩等人来说，理学名儒荣登权要，也算是彻底实现了“内圣外王”之道。

### 3 “内圣外王”的主体特征

“内圣外王”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社会政治伦理，也是一种理想的道德价值。其主体特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内圣外王”的人格特征：君子品行。“内圣外王”的核心是关于理想人格的塑造，梁启超说“内圣外王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体，其旨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而这种“内足以资修养”在儒家看来，就是“君子人格”。君子人格有多方面的内涵，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的“义正”价值；“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卫灵公》）的关怀意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的重礼原则；还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泰伯》）的进取精神。在孔子那里，君子有“三畏”“三戒”，“四恶”“四道”。理学家二程则认为“大抵尽仁道者，即是圣人”（《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能达到“仁”的标准，即可以成为圣人，二程同时还认为：“才德出众，谓之君子”。在理学家看来，道德修养（即内圣）是成为“圣人”的必然阶梯。儒家道统也一直影响和激励着知识分子“成仁”“成圣”。从历史的眼光看，尽管鲜有人能真正达到“圣人”的标准，但是儒学所制定的“君

子”人格给儒者提供了一条实现修养的可循轨迹。

“内圣外王”的责任担当：以天下为己任。“内圣外王”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普遍奉行的价值，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流认识总是把忠君与忠国统一起来，既以“忠诚”作为首要准则，又不看重“愚忠”，尤其反对“投其所好”，“见风使舵”，许多“死谏之臣”反而为人们所敬仰。在中国传统政治中“贬官”文化极具特性，当朝重臣与贬谪官员之间往往并无原则性“界线”，诗联赓和也是一种“常态”。从屈原、贾谊到韩愈、柳宗元、范仲淹、苏轼……不胜枚举。在这样一种价值体系之下，“天下”既为君王的天下，“天下”也是自己的责任，所以有“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铁马冰河之梦”，所以有“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担当。

“内圣外王”的价值认知：忧国忧民。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既是文人士大夫自我修养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重要特质。中华文明有文字记载且形成体系的先秦典籍中都有相关的记载。《尚书》中的《无逸》《酒诰》等篇章，就是基于忧患，还有一些篇章中也不乏告诫，如“无轻民事，惟艰；无安厥位，惟危。慎终于始”。（《尚书·太甲》）。《周易·系辞》则更深刻地进行了阐述：“危者，安其位也；亡者，保其存也；乱者，紊其志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诗经》中忧国忧民的篇章很多，“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雅·小旻》）至今依然“活”在人们的言行中。孔子因忧患于“礼崩乐坏”而周游列国。孟子则直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梁惠王）。陈来先生说“忧患意识的直接后果是政治改革的出现和强化政治秩序的努力”。北宋时期的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都是因“忧”而起。范仲淹“吾尝求古仁人之心”，得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的结论，左宗棠用“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勉励自己，以幕僚出生而终成“中兴名臣”，特别是不顾七十高龄，抬着棺材进疆的壮举，堪称“内圣外王”的经典案例。

#### 4 “内圣外王”在现代官德修养中的价值

“内圣外王”作为中国传统的思想，在千百年来成为儒家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路径。而在当代社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努力实现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双重要求下，创新性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一种客观需求，也是一种历史必然。

效古今贤良，养浩然正气。孔子提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身正”观，赋予了为政者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的必然性。孟子提出要加强人的道德修养，即“养浩然之气”。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无不以各自的方式“养气”，如北宋政治家苏辙沿着孟子的思路，将修“心”和养“气”建立起一种逻辑关系，认为“养志以致气，气盛以充体”。养“气”易致，即“达于义，所以不动心也。不动心，所以致浩然之气也”。不动心，必须有所守。这种“守”就是内心的操守，道德的底线。历史上，文人士大夫在修学为政道路上不断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皆以“循吏”之称为荣。对于现代官德修养而言，养浩然之气就是坚持理想信念，不因困难挫折而迷茫；就是要追求真理、坚持原则，不阿谀奉承、阳奉阴违；就是要立党为公、襟怀坦荡，不拉帮结派、算计他人；就是要作风正派，不为物欲色诱所腐蚀。

立天下宏愿，履为官之责。中国古代圣贤大抵皆有“天下观”。“天下观”作为中华民族的“世界观”，有三个不同层次的解读，在史学领域被看作是空间上的疆域性或者是时间上的秩序性。在思想领域，被认为是“一种文化共同体意识，是先王礼道所灌注的‘文化和制度的世界’”。在政治学领域，被看作是“大同世界”的秩序主张。在“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儒家世界观里，“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成为实现大同理想的必然要求。深受传统儒家文化浸染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将自己的人生放到广阔的“天下观”中进行审视。无论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好，还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也好，都将儒者的个人人格和整个社会，乃至天下家国联系起来，这构成了他们宏大的世界观。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期，精神文化也进入新的历史层次，新的“天下观”呼之欲出。从领导干部的个人层面讲，新“天下观”就是要始终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切实履行好作为人民公仆的职责，时刻谨记党和人民的嘱托，按照“领导就是服务”的要求，一心一意为群众解难事，做好事，办实事，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从国家层面而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推动构建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倡导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拓宽了广大干部的认知范

畴、文化内涵和工作领域,因此也就有了更高层次的家国情怀要求,有了更新内涵的建功立业标准。

树忧患意识,强解忧本领。忧患意识不是忧愁颓唐、患得患失、消极无为的悲观情绪,恰恰相反,而是一种积极进取精神,它所体现的是正视困难、防范风险、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而做好这一斗争“既要坚定必胜信心,又要增强忧患意识”。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再一次强调:面对新时代、新任务,“全党同志一定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当前,我们正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社会治理转型、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深化,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很多,甚至可能发生系统性风险。因而必须牢固树立忧患意识,始终保持清醒头脑,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防患未然。我们坚持有备无患的问题导向,开展了广泛深入的作风整顿,并且提出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长期目标。我们“坚持居安思危的底线思维,催生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思想新战略,既深化了党的建设的理论内涵,又拓展了管党治党的实践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必须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时刻注意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要努力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楷模,带头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尊法守法。”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J]. 求是,2004(19):36.
- [2] 郭庆藩,王孝鱼. 庄子集释[M]. 北京:北京中华书局,2013:936-939.
- [3] 李民,王健. 尚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143.
- [4]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M]. 台北:台北里仁出版社,1982:81.
- [5] 杜预. 左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603.
- [6] 陈来. 儒家的“礼”的观念与现代世界[J]. 孔子研究,2001(1):4.
- [7]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31-134.
- [8] 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60:267-308.
- [9] 荀子[M]. 杨倞注,耿芸标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51-285.
- [10]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12:239.

- [11] 陆贾. 新语[M]. 王利器校. 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86:47.
- [12] 杜甫. 杜甫集校注[M]. 谢思焯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
- [13] 周敦颐. 周敦颐集[M]. 陈克明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90:7.
- [14] 蔡仁厚. 新儒家的精神方向[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226.
- [15] 范仲淹. 范仲淹全集[M]. 薛正兴点校.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374.
- [16] 王禹偁. 小畜集·四库全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699.
- [17]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M]. 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481.
- [18] 全宋文(第56册)[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128.
- [19]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M]. 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319.
- [20] 牟永生. 范仲淹忧患意识研究[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209.
- [21] 陈献章. 陈献章集[M]. 孙通海点校,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87:145.
- [22] 曾国藩. 曾国藩家书[M]. 北京: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4.
- [23]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卷一百零三)[M]. 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4] 论语. 杨伯峻译注[M]. 北京:北京中华书局,2006.
- [25] 程颐、程颢. 二程集[M]. 王孝鱼点校. 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81:182.
- [26] 陆游. 陆游选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125.
- [27] 顾炎武. 日知录[M]. 张京华校释. 长沙:岳麓书社,2011:558.
- [28] 南宋初刻本周易注疏[M]. 王弼、韩康伯注. 孔颖达疏.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03.
- [29] 诗经译注[M]. 程俊英译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01
- [30] 陈来. 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潮[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5.
- [31] 苏辙. 苏辙集[M]. 陈宏天、高秀芳点校. 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90:949.
- [32] 吕文利. 中国古代天下观的意识形态建构及其制度建设[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09):1-11.
- [33] 李宪堂. 天下观的逻辑起点与历史生成[J]. 学术月刊,2012(10):126.
- [34]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学习读本[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197.
- [35]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
- [36] 人民日报评论员. 以“忧患意识”锻造领导核心. 人民日报(N).2016-1-13.
- [37]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35.